

不吐不快

# 斩断打劫式拖车 背后的利益链条

叶祝颐

宁夏车主王学宝在沪陕高速公路陕西商洛段轮胎突然爆裂着火,12公里的路程,光拖车费就收了1万多。处理事故时共花费4万元,加上货物的莫名失踪,这一趟的损失总共在6万多元。王学宝遭遇的天价收费在当地并非个例,据悉,已有291名货车司机按手印联名上书。

车辆出了交通事故,外地司机本来就十分焦急,还被要求支付一笔天价拖车费、事故处理费,这无疑令无助的司机雪上加霜。在事故中,孤立无助的司机除了接受当地交警安排的拖车服务外,根本没有选择余地。拖车公司、汽修厂付出多少劳动,收取多少酬金,本应有一个合理价格,但令人遗憾的是,物价部门没有一个合理的收费标准。到底该收多少钱?全凭拖车公司、汽修厂“狮子大开口”。这种离谱的拖车费无异于趁火打劫。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尽管当地交警、物价部门认为拖车费是协商定价,拖车公司与现场交警为何不向司机事先说明拖车的收费标准?或者给司机提供拖车市场选择,在司机不知情的情况下,拖车公司单方面确定天价收费标准,显然不符合公平交易的原则。

尽管当地交警部门声称应该去找物价部门,但既然规定施救行为要接受交警部门的监督指导,怎么与交警无关?何况,当初未通过公开招标程序,指定西安援手公司“垄断”沪陕高速公路陕西商洛段救援行为,不让其他低价拖车公司上路经

营,本身就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

其实,陕西天价拖车的问题由来已久,去年8月14日《华商报》就天价拖车问题调查发现:汽修厂的工作人员就待在交警大队,一旦有事故发生,汽修厂的工作人员就与交警同时出现在事故现场。针对司机对收费过高的质疑,汽修厂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如果不给交警上供,生意就没法做。原来交警就是天价拖车费的导演与既得利益者,汽修厂工作人员无心之语惊醒梦中人。

早在2009年,就有很多人在这段公路拖车收费混乱,各汽修厂、救援公司自定价格等情况,不断找商洛相关部门举报,但大都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货车司机们无奈之下,投书国务院纠风办,直言商洛天价施救费形同拦路抢劫。从媒体报道来看,国务院纠风办也没能撼动离谱的天价拖车费。

交通事故发生后,需要尽快疏通道路,施救过程就带有强制性。对于这种特殊消费服务,尽早出台规范,终结收费乱象,很有必要。收费标准要广泛征求意见,核算成本支出,避免相关部门制定收费标准市场决策,给天价拖车费披上合法的外衣。

天价拖车费背后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交警部门与拖车企业猫鼠联姻,权力缺乏制约。对此,要激活竞争,避免交警指定的企业垄断拖车市场。如果不规范拖车市场竞争,不对“自肥”的权力动手术,不斩断天价拖车费背后的利益链条,权力脱缰与利益冲动合谋之下,各种执法怪现象仍会层出不穷。

直言不讳

# “吸血高尔夫”拷问生态正义观

刘克梅

据媒体报道,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建设高尔夫球场,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个占地近3500亩的高尔夫项目,竟然建在生态极其脆弱的水利部晋陕蒙砒砂岩区沙棘生态工程“区域。国家历时十余年投入巨大人力、财力和物力培育的大片沙棘生态林被连根挖除,一处曾经郁郁葱葱的防风固沙屏障消亡殆尽。当地干部群众说,国家斥巨资为荒漠之地“输血”,高尔夫球场却成了侵蚀生态环境的“吸血虫”。

将国家巨资建造成的沙棘生态林胡乱糟蹋,将群众的生存环境拖向环保难民营地。我就不相信,当地群众会不举报?当地政府会一无所知?

想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情景,老百姓在自家土地上建个房子,翻修一下,有关部门立马就会赶到现场,追问手续,要求交纳罚款,反应速度相当快。可今天,所有的职能部门都未能发现这个庞然大物——违规项目。而且,这个在建项目公然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没有经过正常的立项和环评审批,不办用地手续,却能一路绿灯,发人深思。而且,这件事反映出某些人缺乏起码的生态正义观。

所谓生态正义观,就是经济、社会发展应该站在全面、均衡、公平、公正的高度认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等社会关系,用理性、求实和正义的原则审视生态文明和生态道

德,最大程度地避免生态危机,构件和谐、公正、真善美的生态观。将正义概念扩大到对自然本身、自然生命和自然界的关心,将权利的概念扩大到自然,确立它们的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生存的权利”。

有些官员只要能造出GDP,为自我政绩涂脂抹粉,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政绩考核目标,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的压力、对于当地居民有限的责任和义务,使得环境问题被忽视。例如,山西省环保局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91.95%的市长、厅长担心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发展。内蒙古某县政府“护送”污水进农田,村民要阻止污水继续排放,当地一位副县长带着十几辆小车、警车开到村头,将十多位村民抓了起来。贵州一个县政府宁肯污染也不愿没钱。这些事例,与吸血的高尔夫球场何其相似。

要想真正落实生态正义观,仅仅象征性强化生态重要性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让官员承受污染之痛,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事业单位不依法责令限期治理或者不按职责责令取缔、关闭、停产,且情节严重的将被撤职。这些条文不仅仅是说说,更要认真落实,将那些非正义的行政作为严厉查办。还可以建立刚性环保考核指标,建立“环保一票否决制”,以确保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两个任务同时发展。吸血高尔夫”才有望得到避免。

王庆

当谈到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时,我们将中国做出的努力称为“通过牺牲资产负债表来美化损益表”,具体表现在银行信贷的猛增以及庞大的政府资本开支计划。现在,随着本次危机最危险的阶段逐渐过去,中国确实交出了一份体面的2009年度损益表。在这一背景下,大家对于中国的高负债,及其对整个中国经济及市场潜在负面影响的担忧却与日俱增。

## 负债快速上升

一般来说,高负债体现了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例如,一个被广为引用的证据就是,银行信贷总规模激增9.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008年GDP的30%,因此导致2009年底未偿还的银行信贷占GDP比重高达127%,位居世界前列。中国迅速增长的高负债率引发了市场参与者的诸多忧虑。

在我们看来,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整体负债水平仍处于相对低位,尚不足以构成系统风险。尽管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内的政府债务在危机过后确实出现大幅攀升,但是,在对中国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地方政府现金流情况进行分析,并且在不同GDP增长率假设下进行压力测试后,我们发现,中国财政的可持续性依然良好,尤其是考虑到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

我们还估计,截至2009年底,经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总额约为6.1万亿人民币,其中近2/3来自商业银行,1/3来自政策银行。

## 数据不体现实际债务负担

我们认为,尽管中国的银行信贷规模占GDP的比重非常高,但更多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中介体系的结构过于简单,

## 财经观察

# 肉价牵动CPI 不可不察

岩雪

目前,猪肉价格连续下跌,短期来看,有助于缓解当前的通胀压力,这是大家都非常愿意看到的局面。但是,对于下跌之后的反弹,目前分歧却超乎预料地严重:一方以券商、草根研究机构为代表,他们认为,猪肉价格大跌之后必然大涨,带来通胀隐患。另外一方则以发改委、商务部为代表的相关部委,他们认为猪肉价格是正常的波动,不会大涨大跌。

对于今年猪肉价格下跌的原因,商务部的解释是,季节因素是主要的,其次是由于去年猪肉价格降到低点后,相关部门启动了相应的收储措施,市场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养猪大户的供给得到了比较充足的存栏数。同样,发改委给出的最新解释是,既受春节后市场需求下降、部分地方出现疫情导致养殖户提前出栏生猪等短期性因素影响,也受生猪生产周期性调整尚未结束,生猪存栏依然偏高等长期性因素影响。

上述解释虽然也是猪肉价格下跌的原因,但这次对猪肉价格之争的焦点就是“疫情”。以券商、草根研究机构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此次猪肉价格持续下跌的更直接的导火索事件还是年初爆发的口蹄疫,认为疫情是导致近期猪价下跌的根本原因。

本次疫情分布面积最广泛,80%的省出现疫情,主要省份都有严重疫情出现,比如养猪第一大省四川的许多地方疫情严重,自从2月初就全面禁止生猪外调,此外像以前疫情影响较小的西南地区疫情爆发得也比较严重。同时,这次疫情死亡率都在50%以上,养殖场户都普遍提前出栏肥猪。”一位参加过几个省实地调研的研究员告诉记者,“目前政府公开通报的疫情仅仅是冰山一角。”

“疫情”一方面导致消费者减少了对猪肉的消费需求,一方面导致养殖户的猪肉大

而非整体经济中的实际债务水平。在中国,金融中介活动的约85%是通过银行来进行的,而股票和债券市场分别只占了10%和5%左右。这与债券及股票市场发挥重要作用的G3国家(美国、欧元区、日本)以及较发达的新兴经济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从这种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只注意到银行贷款的规模,那么,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整体负债水平被夸大了。事实上,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仅占GDP的170%左右,这一比重远低于发达的工业经济体,后者的债务比重通常为GDP的250%至500%。我们认为,金砖四国的平均债务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主要是因为金砖四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发达程度较低所致。

实际上,我们说一个经济体的总债务偏高,并不意味着整体负债额高,同时也表明了其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复杂程度。此外,总负债率作为衡量宏观经济风险的一个有效指标,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资产价格有可能严重贬值,导致无法通过出售资产来偿还债务。不仅本次经济危机是如此,历史上的其他重大金融危机也是如此。

如果不存在严重的资产价格贬值,那么衡量一个国家整体负债状况的更合适的指标应该是外债水平,因为内债通常会被境内资产所抵消。假设整体负债额相同,外债将使一个国家更容易受到国际利率和汇率波动的冲击,而国际利率和汇率是这个国家无法控制的。同时,这个国家必须保持可持续的外汇收入(如通过出口)以偿还外债。

如果按照外债来衡量,中国是全世界债务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这就大大降低了中国由于潜在的外部冲击而有可能遭遇的风险。毕竟,世界上能通过发行

以本国货币为主导的外债来降低外部风险的国家屈指可数,这仅仅是G3等国家的特权。

## 地方负债不危及财政可持续性

由于中国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出现财政赤字,也禁止地方政府举债,因此大家普遍认为,地方政府正是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银行贷款提供或明或暗的担保而维持大规模债务。

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做出准确估算有一定困难。有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甚至指出,2009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高达11万亿人民币,到2011年更将达到20万亿人民币。我们认为,这些猜测都严重夸大了事实。尽管缺少现成的数据,但中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体系非常简单,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进行估算也并非难事,因为所有的地方政府债务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于银行贷款。我们一反自下而上从各种渠道搜集相关信息的做法,通过对银行贷款结构的深入理解,自上而下地推算出经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形成的大致负债规模。

## 处心积虑

# 政府聚财当有度 还富于民是上策

储著胜

关于社会财富分配,我们不能不注意以下两种现象:一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一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政府所占比例不断提高,而居民所占比例则不断降低。这两种现象其实都反映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即社会财富正在不断地在向政府集中。

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总结起来原因不外乎有:一、国进民退现象愈演愈烈,不仅使国企在垄断性行业继续独享超额利润,而且在许多竞争性行业也可以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获取大量的竞争性利润;二、在土地资源日益紧缺的情况下,政府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卖地,攫取了数以千亿计的土地收入;三、名目繁多的税费项目,使政府能够在各种场合、各个环节都能获得它们所想要的收入;四、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国企占据了大部分资源,中小企业在银行信贷、股票发行、债券融资等各方面都处于下风,在财产性收入成为收入分配重要手段的形势下,拥有资金优势的国企自然就掌握了收入分配的主导权。

财富过度集中于政府,虽然增强了政府的经济领导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但是它所引起的不良后果却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抑制了国内需求的扩大,进而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财富在一定时间内总量是一定的,政府拿多了,留给老百姓的自然就少了。居民收入增长有限,其消费能力也就难以提高。消费不旺,它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就会减弱,经济增长速度也就受到影响。居民没有足够的钱去消费,生活水平又怎么能提高呢?

其次,它抑制了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进而削弱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中小民营企业虽然不是中国经济的领导者,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财富过多地集中于政府,不仅使居民收入减少,同时也使中小民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相应减少。在缺乏足够资源的情况下,面对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其最终结局如何可想而知。中小民营企业不振,中国经济也就不可能保持健康高速增长。

再次,政府拥有了大量财富,难免会有进行各种投资的冲动,其

具体而言,2009年底银行对外贷款总额为40万亿人民币,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推断出哪些项目是不可能经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生的,如住房贷款、短期贷款、房地产商的中长期贷款,以及其他类型的中长期贷款,并且将除以上各项之外的贷款归入经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款的范畴。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估计经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金额为6.1万亿人民币左右,约占银行总贷款的15%,占GDP的18%。

通过压力测试,我们认为,即便考虑到地方政府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提供担保,中国的总债务以及政府债务水平也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财政的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政府愿意为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提供偿还担保的话,它能够在不危害持续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做到这点。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朱若愚译)

## 焦点评论



结果就很可能带来了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最近,湖北省提出了一个总额高达12万亿、数目惊人的背景形势下,政府盲目投资的冲动难以遏止。而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一旦出现,结果必将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最后,政府拥有了大量财富,还会诱发各类寻租活动和腐败行为。钱多了,权力又不受约束,结果会如何大家不难想象。

政府拥有过多的财富,本来可以在教育、医疗、教育、安居等方面有更大的作为,但是看看我国的现实,却正好相反,恰恰是在这些民众所需要的民生项目上,政府长期投入不够、欠账累累。

据此,分配制度改革一个重要的内容应该是调整政府和企业以及居民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具体地说,就是降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的份额——一方面实行结构性减税,取消各种不正当的收费、改变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另一方面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政府收入份额下降了,又如何能够确保各类民生项目的支出呢?根本的途径是政府要改变自身的职能,把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公共管理作为第一要务,坚决从经济建设投资人的角色中摆脱出来。此外,还要让国企真正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垄断性行业的进入门槛也要逐渐降低,以便让中小民营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政府还要进行机构体制改革,实行精简机构,严惩腐败。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由社会财富的聚敛者变成民众财富的守护者。

一个人民的政府是应该有勇气从自身进行改革的。政府不还富于民,所谓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必将只是一场空欢喜。

##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l18@126.com;或寄信到深圳彩田路5015号证券时报评论版(518026)。